



QUNXIONG
JUEQI

群英雄崛起

辛|亥|长|沙|精|英

丛书主编○薛其林
本册作者○伍春辉



QUNXIONG JUEQI 群雄崛起

辛|亥|长|沙|精|英

丛书主编○薛其林
本册作者○伍春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雄崛起——辛亥长沙精英/伍春辉编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 9

(辛亥革命与长沙)

ISBN 978 - 7 - 5355 - 8632 - 2

I. ①群… II. ①伍… III. ①辛亥革命 - 历史人物 -
生平事迹 - 长沙市 IV. ①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581 号

群雄崛起——辛亥长沙精英

丛书主编: 薛其林

本册作者: 伍春辉

责任编辑: 易 武

责任校对: 曾朝晖 郑 璐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 - 85486742 QQ 228411705

总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张: 16.75 字数: 250 000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5355 - 8632 - 2

定 价: 49.5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XU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三列火车头，前后相继，奔腾前进。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三位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文选》第2卷）。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长沙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历史名城”。作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地，“长沙”之名，早在3000多年以前的西周就已存在。悠久的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其中马王堆古汉墓、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和唐代铜官窑釉下彩等考古发现震惊世界。同时，长沙也是一座人才辈出的“文化名城”。从古代湘楚文学的开创者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李东阳、王以宁等，到湖湘经世文学时期的王夫之、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等。“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的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一脉相承，“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更是激励长沙人才辈出，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座万人景仰的“革命圣城”。戊戌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辛亥首臣黄兴，护国将领蔡锷，政党政治第一人宋教仁，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些都是引领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演进和社会变革的突出代表，造就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功业和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这种厚重的文化底蕴为当代长沙经济文化事业和城市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辛亥革命前后，长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

和重镇。伟大的长沙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浴血奋斗,谱写了一曲曲震撼山河的壮歌。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革命运动的持续开展,新一代的三湘俊杰(黄兴、蔡锷、宋教仁等)脱颖而出,成为挽救时艰推动社会进步的骨干,发动和领导了一波接一波的思想启蒙和革命运动,极大地推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沙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城市,勇当社会责任、率励敢死、“敢为天下先”的长沙精神进一步彰显,并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这种爱国意识和进取精神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拓展,直接催生了以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等为代表的现当代革命家和政治领袖群体,使长沙成为全国瞩目和耀眼的革命圣地和摇篮。

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事变的发生,都离不开思想舆论、严密的组织和大规模的运动三个要素。辛亥革命前后,长沙作为革命重镇(辛亥元勋诞生地、红色火种酝酿地、辛亥武昌起义首应地),在革命思想的宣传与发动、革命组织和方略的策划与部署、革命行动的坚毅迅猛等方面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充分彰显了长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同寻常的地位和影响。

就革命思想的宣传与发动方面而言,辛亥革命前夕,长沙人就大力倡导和宣传“排满”革命、暴力革命、民主共和思想,使得“排满”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其间,各种由长沙人创办的反清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性的反清革命思潮的高涨。其中以报刊《国民报》《游学译编》《洞庭波》《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文章《猛回头》《警世钟》等影响尤为突出。反清志士杨毓麟在流亡日本后,创办了“湖南编译社”,发行《湘学译编》,以“湖南之湖南”为名发表了《新湖南》一文,积极鼓吹革命“排满”,要求先“鼓吹民族革命”,后“推行民权革命”。易白沙在《帝王春秋》一书中,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全面揭示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帝王政治上的反动、思想上的愚昧、生活上的荒淫,呼吁人民起来彻底推翻吃人的帝王专制制度。《民报》创刊后,陈天华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以及《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文章,再次强调:“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宁举吾侪尽牺牲之,此目的不可不达。”这些主张对改良主义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提醒人们不要迷信维新派的改良主张,更不要为清政府的假“宪政”所迷惑,而要吸取教训,走暴力革

命的道路,从而使长沙成为了全国暴力“排满”革命的先锋和中心。也正是在这种激进暴力革命思想主张的影响下,无数辛亥志士毅然决然投身反清革命的洪流中。

比较江浙、广东等地的革命思想,湖南长沙的革命思想更激进,充分凸显了暴力革命的色彩。在长沙的带领下,“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等“排满”革命和激进暴力革命的思想口号迅速传遍全国。

就革命组织和方略的策划与部署而言,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长沙即已成立了华兴会等民主革命组织,精心策划和准备了革命的战略、策略、手段和方法。

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成立,并积极准备力量筹划长沙起义,成为全国武装革命的中心。华兴会会员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分布省内外,还建立了同仇会、黄汉会等外围组织。华兴会的筹建,标志着长沙和湖南革命组织上的重大发展,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从此,革命风潮弥漫三湘和全国。

华兴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比较明确的革命方略,黄兴等在确立了暴力革命方式的同时,也认识到了革命成功的突破点。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能从都去首都“建瓴以临海内”开始,“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明确提出了中部一地发难、他地驰援的方略对策。就中部形势分析,湖南长沙和湖北武昌是理想的发难之地。因此,在黄兴的支持,宋教仁等的策划下,谭人凤、焦达峰等在湘鄂之间积极运作了长江流域起义事宜。

在革命的主体、内容和目标上,辛亥长沙志士跳出了狭隘的精英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局限,上升到精英革命与国民革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相结合的高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一度将革命的主体侧重于会党、军人、知识界和上层人士身上,对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大众的力量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辛亥革命前夕,陈天华、宋教仁认识到以前的中国革命是少数人的“英雄之革命”,今天的革命则是多数人的“国民之革命”,开始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和地位。华兴会在长沙成立之时,黄兴最先倡导并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在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方面,长沙的辛亥志士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杨毓麟要求以“排满”为手段的同时,实现民主共和的民主革命目的。陈天华也鼓动“排满”与宣传民主同时下手,在其《绝命辞》中更是强调,“反满”不是狭隘的“排满”,要求把政治问题与种族复仇问题区别开来,不仅要反对满族贵族,而

且要反对封建的汉族贵族。宁调元虽主张激进“排满”，但在民族问题上，则倡导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更反对滥杀满人，从而在“排满”的民族革命中凸显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

历史证明，要完成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统治下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使命，这一民众革命的方略是绝对必需的，也是极为正确的。也正是因为有了民众革命思想的基础和铺垫，所以，长沙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早影响最大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策源地。

就革命行动的坚毅迅猛方面而言，辛亥长沙志士可谓言行一致，前赴后继，以坚毅果敢的行动再次彰显了“湖南骡子”的精神面貌。

1900年8月，浏阳人唐才常、林圭、沈荩、秦力山等以两湖和安徽为基地，发动自立军起义，标志着戊戌维新运动改良主义道路的基本结束，成为以后同盟会领导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先声。1904年11月，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联络会党发动的长沙起义，震惊两湖，波及国内外。正如孙中山所说：“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1906年5月23日，长沙的湖南同盟会员禹之谟等发起了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位烈士的活动，构成了1906年湖南学界风潮的主要内容之一，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

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起义可以说是长沙人民反清革命之预演，也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这次起义，不仅声势浩大，而且第一次举起了“中华民国”的旗帜，因而震惊了长江沿岸各省。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长沙首起响应，焦达峰立即组织举行长沙起义，光复长沙，使湖南成为第二个宣布独立的省份。“武昌响，长沙应”，长沙首应的作用由此可见。与此同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最关键时刻，长沙立即组织援鄂军。湘军的入鄂作战，对于安定武汉前线人心，加强以黄兴为总司令的武汉保卫战的力量，促成各省的光复，发挥了巨大作用，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统治在全国范围的迅速解体和辛亥革命的胜利。

创业者道艰；承之者任重。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开端，为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选集》第5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之而起，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成功开拓

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全新面貌。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出版《辛亥革命与长沙》丛书,对于促进社会各界更深刻地理解辛亥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弘扬民主革命精神,进一步彰显长沙人的爱国热情、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长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时代价值。

长沙学院长沙文化研究所的教授们,早在去年就精心策划撰写《辛亥革命与长沙》丛书,来纪念伟大的辛亥革命,来凸显长沙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丛书共有5册,《时移世异——辛亥长沙巨变》,主要论述辛亥革命时期长沙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领域的巨变。《铁血共和——辛亥长沙风云》,主要叙述长沙辛亥革命的史实,凸显辛亥革命时期长沙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兼顾辛亥前后(戊戌维新、援鄂战争、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长沙崛起成为全国最富有生气的城市的进程。《群雄崛起——辛亥长沙精英》,分类分层次记叙辛亥革命期间长沙涌现的革命志士的光辉事迹。《敢为人先——辛亥长沙精神》,主要阐述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时期,长沙一批近现代革命家的成长经历以及长沙精神逐步形成、不断丰富的发展历程。《共和足迹——辛亥长沙遗址遗迹录》,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收录辛亥革命期间名人故居、墓葬、活动遗址等。

在丛书杀青付梓之际,特作此序,以纪念为民主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斗士们。希望新一代长沙人进一步弘扬民主革命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建功立业,再创辉煌。

是为序。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陳洞兒

2011年9月

前言

QIANYAN

自

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史在风云激荡的巨变中跨越了一百年。这一百年既是封建旧中国衰败乃至灭亡的终点,又是现代化新中国萌芽壮大的起点。

回顾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可以用“变”与“新”两个字来概括:百年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和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变”字,而百年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和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新政、新民、新文化就代表了百年思想文化的进路。“新政”旨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政治模式,“新民”旨在实现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新文化”则是对二者的整合,是波及社会各层面的全新思想启蒙。它表明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启蒙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表明现代化运动已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康、梁沿着复古求解放的老路,以天赋人权为武器,进行托古改制与仿洋改制,开启了近代“新政”运动的第一幕。托古是形式,仿洋是内容,打破专制独裁、建立民主政治是其核心。平心而论,戊戌新政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的成败,而在于它破天荒在中国历史上自觉尝试自上而下反封建的实践,并由此揭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新政”浪潮。从1905年的清末“新政”到1912年中华民国的创立,再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新政”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其最大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新政”



运动上的承前启后和政体上的创造性转化。在其一生当中,政治思想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一是由温和的维新改良到激进的起义革命的转化;二是由“仿洋改制”到化合中西的政体构想的转化;三是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化。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使命和“驾欧美而上之”的良好愿望使得孙中山渐渐倾向于寻求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健全的经济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倡行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在“避害”(消除资本主义贫富不均)之心重于“兴利”(力争国家富强)之意的心态下,孙中山毅然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道路。可惜天不假年,事业半道而陨。

创业者道艰,承之者任重。反帝反封建和现代化的双重使命历史地落到共产党人身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的卓绝斗争终于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长达半个世纪的“新政”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内忧外患交至并出的时代背景下,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政”史上,康、梁维新改良的失败和孙中山武装起义、毛泽东武装斗争的胜利,说明:革命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与政治斗争的军事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向近代国家过渡时期政治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伴随政治运动的持续推进,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发展。随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政体的轰然倒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由此开启,中国社会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二

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伟大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上承维新运动,下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君主专制,开启了民主革命的崭新征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次年,兴中会总部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表明孙中山放弃了和平改良的幻想,踏上了武

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由此开始。1903年夏至1904年初,陈天华泣血成书——《警世钟》《猛回头》,号召人民“同饮一杯血酒”,“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浸润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反帝爱国思想。民主革命思想由此广泛传播。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标举“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革命运动持续高涨。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组织上确立了革命领导权。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朝气蓬勃,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相继组织领导了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一系列反帝反封建运动。与此同时,革命党人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先后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1908年的华南沿海沿边的六次起义,1907—1908年的浙江、安徽起义,1910年广州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后6年波及南方各省的十多次武装起义,尽管失败,但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胜利和湖北军政府的建立,使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首先起来响应的是湖南、陕西两省。随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安徽、江苏、浙江、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及上海均宣告独立,建立了军政府。在革命洪流的猛烈冲击下,清王朝陷于土崩瓦解之中。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

三

辛亥革命是在南方革命党人组织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湖南、广东、湖北厥功甚伟。其中,湖南(长沙)更是中坚骨干和核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辛亥革命酝酿发展的十余年间,长沙革命志士怀抱爱国热忱,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或宣传革命思想,或构建革命组织,或策动反清起义,长沙一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和民主革命的中心。

首先是革命人才的贡献。长沙人杰地灵,自古为南国重镇。近现代以降,更是群英蔚起,人才辈出,前赴后继,巍巍壮举,海内瞩目,举世称奇。在这个

“凤凰涅槃”的时期，长沙人民放眼世界，勇立潮头，以其坚韧率励、爱国自强、求是进取、敢为天下先的独特秉性，书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历史长卷。戊戌维新运动，长沙独步一时，使这座“铁门之城”一跃而成“最富生气”之城。1904年7月，长沙开埠，新学澎湃，新的社会思潮涌动，新兴社会阶层不断崛起，民主革命热情高涨。

辛亥革命期间，在长沙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产生了以黄兴为核心的民主革命家群体：辛亥首倡黄兴，政党政治第一人宋教仁，首义元勋蒋翊武、刘复基，首应武昌起义的英雄焦达峰、陈作新，运作本地革命的谭人凤、秦毓鎏、吴禄贞、刘揆一、刘道一，响应辛亥革命和捍卫民主革命成果的蔡锷（云南都督）、沈秉坤（广西都督）、孙道仁（福建都督）、黄钺（甘肃秦州都督）等，他们或在长沙本地发动宣传，或在外省组织策划，或筹款筹械，或身先士卒，在反清护国的革命斗争洪流中，共同谱写了一曲响彻中华大地的英雄壮歌！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黄兴身上就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期间长沙革命先烈的精神风貌。黄兴认为，民力、民气是国家兴亡强弱的根本，主张培养尚武好勇、自立自强、爱国爱种之精神。从日本回国后，黄兴直接领导同盟会开展政治、军事斗争。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线，冲锋陷阵，且愈挫愈奋，屡败屡战，“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彰显了“湖南骡子”的血性。在同盟会组织领导的10多次大规模的起义中，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就有8次。武昌起义正当战事吃紧之际，黄兴亲赴汉口前线，组织指挥对清军的反攻，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信心，并促成了其他各省相继起义，成为武昌起义成功的关键因素。曾经参加武昌起义的元老居正后来说过这样一段话：“自黄克强坚守汉阳以后，各省得乘机大举，次第响应，俾革命军声威日壮，基础日固，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使当日无克强，则汉阳能守与否，尚属一问题……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苦茹辛，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党之崛起……然使武昌起义仅如昙花一现，则各省无从继起矣。阳夏之艰苦支持，自不得不归功克强。”居正这番肺腑之言，无疑是对黄兴主持阳夏保卫战的最中肯的评价。正是黄兴的卓越贡献，所以才有“无君即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的史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旗帜，黄兴是辛亥革命的旗杆。

其次是思想理论和舆论宣传的贡献。思想启蒙从来都是革命的先导。辛亥革命前夕,长沙人就扛起了倡导和宣传武力“排满”、暴力革命、民主共和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下,“排满”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这期间,由长沙人创办的反清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国民报》《游学译编》《洞庭波》《二十世纪之支那》《黄帝魂》等影响尤著。此间,“排满”反清的理论宣传人物也独步一时,彪炳千秋。反清志士杨毓麟的《新湖南》、易白沙的《帝王春秋》、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无不竭尽全力鞭挞君主专制暴政,宣扬武力“排满”,反对立宪改良,号召暴力革命。骤然之间,“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的呼声,传遍神州大地。这样,曾经沉睡百年的思想得到了启蒙,饱受屈辱的人心受到了鼓舞,万马齐喑的局面得以全面打破,革命的星火纷纷得以点燃。长沙因此成为了全国暴力“排满”、民主革命的先锋和中心。

再次是革命战略策略的策划和革命行动坚毅果敢上的贡献。长沙最早提出了中部暴动、他省驰援的战略策略,并多次尝试了中部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之前,1904年黄兴等在长沙组建了华兴会以及同仇会、黄汉会等外围组织,积极策动长沙起义和萍浏醴起义。此后,长沙革命党人形成了革命“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明确提出了中部一地发难、他地驰援的方略对策,决定以湖南长沙和湖北武昌为发难地。长沙革命党人谭人凤、焦达峰等在黄兴的支持,宋教仁等的策划下,积极奔走于湘鄂之间,积极运作长江流域起义事宜。因此客观地讲,武昌起义是谋划于长沙,策动于长沙,长沙是民主革命真正的策源地。值得注意的是,武昌起义打响反清第一枪后,在清王朝十八个省会城市中长沙是最先响应革命、声援革命的城市。“武昌响,长沙应”,革命遂有了全国性的意义。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派北洋精锐前往镇压,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群龙无首,士气低落,革命成败危于累卵,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长沙先后组织五批援鄂义军,奔赴武昌前线,加入反清第一线,与鄂军兄弟并肩作战。英勇善战的湘军加入鄂军前线,安定了武汉前线人心,加强了以黄兴为战时总司令的武汉保卫战的力量,促成了全国各省的呼应和光复。因此可以说,湘军的参战,直接导致了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的迅速解体和辛亥革命的胜利。

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体制转轨时期,是古老中国走出落后愚昧、走向世界、走上现代化新生的艰难阵痛阶段。在这历史

发展的重要拐点,英雄的长沙儿女,挺身而出,自觉担负起救国救民的伟大使命,以爱国自强、敢为天下先的独特秉性和舍生取义、一往无前的精神,挺立潮头,成为挽救时艰和复兴民族的脊梁。

麓山巍巍,湘水泱泱,橘洲挺立,星城开泰。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是为了激励新一代的长沙人进一步弘扬这种爱国意识和进取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断发愤图强、开拓前进。

薛其林

2011年9月



总

论

经世·自强·进取

近代化大潮中的长沙与长沙精英

“精

英”指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把握契机、洞察动向,以其价值取向、态度、言行深刻影响乃至改变历史进程的极少数优秀人物。

古往今来,从柏拉图、马基雅弗利到司马迁、梁启超、蒋廷黻,都曾毫不隐讳对于精英的推崇。英国哲学家卡莱尔甚至断言,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精英们的历史。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并不回避精英人物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普列汉诺夫曾说,千百个平凡的天文学家代替不了哥白尼或牛顿,千百个平凡的音乐家也不会使人们获得贝多芬、舒曼、肖邦给人们的那种享受。

近代以后的中国,国难频仍、危机四伏,各路精英粉墨登场,英雄辈出。作为传统中国典型区域的湖南开始走出边缘化,“天下称之”,成为近代中国的人才渊薮。激荡风云中,湖湘文化重镇——省城长沙更是精英迭出,他们以积极

进取的姿态,投身于社会的变革大潮中,他们与时俱进,应势而起,创建事业,成为时代骄子,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复兴的历程。

《群雄崛起——辛亥长沙精英》作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丛书《辛亥革命与长沙》其中一种,讲述一个世纪前那场改变近代中国发展走向的革命狂潮中成批涌现的长沙精英,题中的长沙不仅仅局限于现有行政区划的六区三县市,而是取历史上“长沙府”范围。自明洪武五年(1372)起潭州府改名长沙府,隶湖广布政使司,辖11县1州:长沙县、善化县、湘潭县、湘阴县、宁乡县、浏阳县、醴陵县、益阳县、湘乡县、攸县、安化县、茶陵州,府治长沙城。时间范围方面,基于人才形成与发展的延续性,本书将时间范围延伸至戊戌变法之前,护国、护法战争之后;相关人物遴选,既包括长沙籍的本土精英,又包括非长沙籍但与长沙有过重要渊源、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长沙历史上留下重要痕迹的精英。

邓世·熊白·世宗

长沙历来是湘楚重镇。近代以后,湖南在全国地位日隆,英才辈出,地处湘江中下游地区的长沙、湘潭、平江、醴陵、浏阳、湘乡更是繁星闪烁。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和贡献上,长沙精英都当之无愧是全省最突出的。近代湖南精英,大致可归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志士、黄兴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四个精英圈,以其籍贯湘乡、浏阳、长沙、湘潭为圆心画圈,这四个圈相连的地域杰出人物占同期全省精英的一半以上,从清道光到民初,长沙籍的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就有20多人,如谭继洵、谭钟麟、劳崇光、张百熙、黄拭、瞿鸿机、谭延闿、刘人熙等。

第一,面对近代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最先提出破解之道“师夷长技”的是湖南人,第一批履践“师夷长技”主张的是长沙人。

鸦片战争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湖南邵阳人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自此,“师夷长技”成为中国求富、求强一以贯之、及于今日的主题。此后当魏源的主张淹没于依然沉睡的大多数国人,是以曾国藩(长沙府湘乡县人)、左宗棠(长沙府湘阴县人)为代表的长沙人

率先成为“师夷长技”主张的履践者。

论及近代中国、近代湖南、近代长沙,曾国藩与湘军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曾国藩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朝,客观上也成为传统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推手。湘军影响之下,“碌碌无为于天下”的湖南开始大为改观。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他所创办的洋务事业,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制造出旧中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①;他听从容闳建议,开启我国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先河;他对湘军“别具一帜,改弦更张”的改革,逐渐用洋枪洋炮代替长矛大刀,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转型的第一步。此后湘军阵营的左宗棠、郭嵩焘等为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积极呼吁并履践“师夷长技”主张,在推动传统文化和社会近代化转型同时,通过榜样的激励作用,指引更多的长沙精英面对现实,面向世界,向新派精英转化开辟了新路。

第二,戊戌维新期间,湖南是最开风气的省份,长沙更是众星云集、全国瞩目的焦点

甲午战争后,开明大吏陈宝箴主持湘政,其时省城官场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继任徐仁铸等,思想开明,锐意改革,一大批热血青年如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鼎、林圭、沈荃、秦力山、唐才中、李炳寰等,聚集省城长沙,“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梁启超语),有的只是一腔热血。他们率先兴办新政,开学堂、兴学校、办报纸,一时间从长沙至整个湖南“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天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②,这一大批维新志士中,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的是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沈荃、林圭、秦力山等都为救国图强而壮烈牺牲。

第三,辛亥革命,湘人首应,这其中又以长沙人牺牲最多、对革命贡献最大

辛亥革命中打头阵的是湖南人。同盟会创会元老 79 人,湖南人最多,占 1/4 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更是主将。武昌起义爆发后两天,长沙新军士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第 25 页。

^②梁启超:《戊戌变法变记·湖南广东情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